

#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季刊)

1979年创刊  
2016年1月10日出版

## 目次

2016年第1期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 “抗战歌曲”学习笔记——写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后 于林肯 / 1
- 孤独的冼星海——近年来抗战题材音乐创作掠影及思考 项筱刚 / 14

### 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

- 民族音乐学传入后对我国已有传统音乐研究的否定  
——“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之一 杨善武 / 20
- 乐器家族中的一个另类——机械乐器 金经言 / 36

### 中西音乐交流

- 基督教传教士与宁波早期音乐教育 宫宏宇 / 40

### 岭南音乐文化研究

- 广东音乐之现状 黄日进 / 52
- 音乐地理学视域下的广东陆丰正字戏生存缘由研究  
张姗姗, 马 达 / 58
- 岭南珠玑“旱地龙船歌”调查报告 赵旭超 / 65

· 中外音乐交流 ·

# 基督教传教士与宁波早期音乐教育

宫宏宇

(宁波大学 音乐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文章以目前所知中国大陆最早设立音乐课的宁波崇信义塾、安格妮丝·郭士立与宁波男童学校歌唱班、海伦·倪维思 1850 年代在宁波的音乐教学活动、宁波 1856 年刊行的曲谱赞美诗《赞神乐章》、1858 年在宁波刊行的五线谱课本《圣山谐歌》为例, 对五口通商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宁波开设的音乐课及学校课外的音乐活动进行分析, 旨在客观地审视传教士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上所担当的角色。

**关键词:** 基督教传教士; 音乐教育; 崇信义塾; 安格妮丝·郭士立; 海伦·倪维思; 罗尔梯; 《赞神乐章》; 应思理; 《圣山谐歌》

DOI: 10. 3969/j. issn. 1008-7389. 2016. 01. 005

中图分类号: J608. 5; J60-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389 (2016) 01-0040-12

## 引言

关于近代学校音乐教育在中国之肇始, 国内大部分学者都将其理解为是一种二十世纪初才出现的、与清末出现的“留学日本热”和清政府为实行新政而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密不可分的一种特殊的现象, 它的具体标志则是“学堂乐歌”的兴起。笔者认为, 此认识缺乏对基督教会与现代中国音乐教育关系之理解。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至少可上延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而不是通常所认定的二十世纪初。<sup>[1]</sup>学界之所以对传教士所做的工作认识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教士音乐教学工作的案例缺乏了解。本文即以基督教传教士十九世纪中期在宁波实施音乐教育的具体案例来讨论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肇始之问题。具体来讲,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 1844-1860 年基督教会在宁波的音乐教育实践, 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1. 客观地审视传教士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初始期所担当的角色; 2. 厘清宁波早期音乐教育之史实; 3. 分析基督教士音乐教育之具体内容。本文考察的对象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宁波的音乐教育和出版活动, 不涉及天主教会类似的活动。鉴于国内学者多利用常见的中文或译成中文的传教士文献, 本文将集中采用留存在海外图书馆、档案馆的相关文献并参照近年的研究成果, 史料来源主要为当时出版的英文报纸和期刊, 以及当事人所写的回忆录。中文相关的史料如果国内有关论著已经引用, 则不再重复, 只提供索引。

## 一、崇信义塾的音乐课及课外音乐活动 (1845-1860)

早期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音乐教育活动是以其传教的附属品的形式出现的。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 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商埠之一, 于 1844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埠。开埠后的宁波不久就有西方

收稿日期: 2016-01-04

作者简介: 宫宏宇 (1963-), 男, 新西兰籍华人, 宁波大学兼职教授, 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西方文化交流、海外汉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国音乐史研究。

· 40 ·

各国基督教派宣教士前来传教。在宣教的同时，这些传教士也举办音乐活动。从现存的早期教会的资料可以发现，宁波基督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学的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代中期。最早提供音乐教学的是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于1845年7月26日在宁波江北槐树路创办的男童寄宿学校——崇信义塾。<sup>[2]346</sup>与1839年由“马礼逊教育会”在澳门成立后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一样<sup>[3]1;[4]64</sup>，崇信义塾不仅自创校之初就已设立“音乐课和体育课”<sup>[5]39</sup>，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多与音乐有关。如学生需要学习唱圣歌，参加一早一晚的祷告活动，在周末也得上主日学校。<sup>[6]30</sup>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到1848年，崇信义塾的学生在传教士医师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 1820–1900）主持的中文礼拜仪式上不仅已可以唱赞美诗，而且演唱的水平也已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sup>[6]61</sup>1850年代即到宁波、后来成为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在其1854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就提到他去宁波长老会教堂时听教徒唱圣诗时的感想：

那里做礼拜的形式和韦斯理卫理会教徒采用的形式大不相同。他们从祷告开始，然后念一章圣经；接着唱歌，然后又祷告，接着是讲道。之后唱一道赞美诗，祝福完毕，宣布结束。我认为唱歌唱得特别好，麦嘉缔大夫和夫人的嗓子都很好。最令人高兴的是唱歌过程中所有的人都是那样全心全意地唱。<sup>[7]75</sup>

为了使崇信义塾的学生能将赞美诗唱得更好，宁波差会还特地要求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会从美国国内购买乐器。<sup>[6]61</sup>值得注意的是，麦嘉缔主持的这种包括唱圣歌在内的中文礼拜仪式一直持续了11年。<sup>[8]90</sup>在1850年代中后期，宁波的基督教传教士还引领风气之先，率先在内地编辑刊行有曲谱赞美诗集。仅1850年代就先后出版了便于信众学唱的印有五线谱谱例的赞美歌集《赞神乐章》和印有简单乐理介绍、五线谱谱例和“主音嚟乏”记谱法的赞美歌集《圣山谐歌》（详见下节）。<sup>①</sup>

## 二、安格妮丝·郭士立（Agnes Gützlaff）与宁波男童学校的歌唱班

早期在宁波教授中国学童音乐的不仅仅有来自美国差会的西人传教士，也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教徒。他们也为宁波早期的音乐教育活动做过奠基的工作。笔者所见的有关教会学校音乐教育情况的史料就提到过一位中国女盲童，这位叫安格妮丝·郭士立（Agnes Gützlaff）的孤儿（见下图1）曾在1855–1861年间在宁波教授过音乐，还为宁波英国安立甘会教会组建了一个唱诗班。



图1 安格妮丝·郭士立孤儿<sup>②</sup>

① 崇信义塾后于1867年11月迁往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但搬迁后的“育英义塾”（后升格为书院）仍有音乐课。特别是1880年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夫妇接手后，课程安排力图与美国同等学校接轨，音乐课也越来越正规，一直到学校成为之江大学。参见 Clarence Burton Day, Hangchow University: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pp. 12–20.

② 图片资料来源：Female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March 1, 1861, p. 33.

安格妮丝·郭士立五岁半时就被普鲁士来华传教士、基督教路德会宗（Lutheran）的牧师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亦译郭士立, 1803-1851）送往英国, 1842年1月3日正式进入伦敦盲人学校读书。<sup>①</sup>十三年后, 完成了专业盲人教育学业的安格妮丝被派回中国。<sup>[9]7</sup>安格妮丝在英国期间应该是受过专门的音乐教育的, 她也常常参加教会的歌咏唱奏活动。如在一篇发表在1867年3月的一篇题为《中国盲人教师》的英文短文中, 就有她在伦敦时和另一中国女盲童每年都在英国盲人教育学会年会上朗读与歌唱的回忆。<sup>[10]33</sup>这位出身贫贱、没有中文姓名（郭士立将他收拢来的无名无姓的中国孤女都统统改姓他的姓郭士立（Gützlaff）、而且连生卒年月都不详的中国女盲童却成为了“中国悠久历史上第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盲文教师。”<sup>[9]17</sup>但安格妮丝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中国盲童的早期教育上, 她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意义也同样值得关注。目前可见的资料表明, 安格妮丝不仅在音乐上颇有造就, 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教授正常人西洋音乐的盲人。<sup>②</sup>

少小离家的安格妮丝回到中国后, 无论在生活上或工作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难。教会中的一些人士对她有成见。认为她五岁半时就离开了中国, 汉语说得不好, 中国的风土人情更是一窍不通, 对教会传教事业几乎没什么大用。1856年在宁波, 后来创办超宗派跨国界基督教差会组织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甚至把她看成是教会的一个包袱, 抱怨说她虽然“弹钢琴弹得不错……但对中文一无所知”。<sup>[9]15</sup>所幸的是, 宁波开埠后第一个来甬办学的基督教独立女传教士艾德绥（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对安格妮丝伸出了救援之手。<sup>③</sup>1856年6月, 安格妮丝开始在艾德绥办的“宁波女塾”工作<sup>④</sup>, 负责教三个女盲童读书。为了使安格妮丝将伦敦所学派上用场, 艾德绥1858年又在宁波开办了一所盲童技工学校, 由安格妮丝负责该校学生的阅读课。<sup>[9]13-16</sup>目前所见的资料表明, 安格妮丝在宁波教会的工作中充分运用了她的音乐特长, 不但自食其力, 还因工作出色得到了教会的赞扬。当时担任英国安立甘会宁波副主教（后成为华北主教）的禄赐悦理（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 1821-1879）就非常欣赏她的音乐才能。这在1861年11月给《教会传教记录》的一封信中, 禄赐悦理对她所组织的音乐活动予以肯定。他特别提到安格妮丝在督导她的盲人技工学校的同时, 还“为我们教会那些有音乐耳朵和音乐趣味的成员和我们男童学校的几个男孩”组建了一个唱诗班, 正是“通过了这一办法, 才使得我们在那年的下半年有了把对上帝的赞誉既能唱出来, 又能用话语在当地的教堂中表达出来的能力。”<sup>[9]16</sup>

禄赐悦理的这些赞美安格妮丝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正像林键在一篇纪念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 “唱诗班这一圣乐事工组织的出现对教会圣乐的发展有非凡的意义。从教会角度方面来看, 诗班是教会专门的音乐事工团体。诗班的献唱在教堂音乐崇拜中具有表率作用。崇拜聚会的领诗者

① 学界谈到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时, 一般把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医师麦嘉谛（Divie Bethune McCartee）收养的金雅妹（1864-1934）说成是“中国女留学生第一人”。但安格妮丝·郭士立的例证证明, 早在1842年1月3日就有中国女童被伦敦盲人学校正式录取, 她们的留学生涯比金雅妹1881年赴纽约学医早了近四十年。

② 关于安格妮丝·郭士立, 笔者在《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第105-106页）一文中有更详细的叙述。

③ 艾迪绥是最先在宁波创办女塾的新教传教士。她的学校约于1844年（一说1843年）开设在祝都桥（今尚书街与呼童街交汇处附近），艾迪绥1861年退休到澳大利亚后，该校与宁波美国长老会开办的女学堂合并。详见 Margaret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11), p. 35.

④ 音乐是否为“宁波女塾”课程的一部分, 我们不知。但是据另一女传教士说, 她1857年在上海叫 Christiana A-Kit 的家中看到有风琴, 而且摆在最明显的地方。这表明 A-Kit 很可能会弹风琴。A-Kit 是艾迪绥最早期的学生, 艾氏在宁波办学时, 她是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艾迪绥在教学中可能用到过风琴。详见 Carl T. Smith,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73.

和司琴者具有带来会众作用。”<sup>[11]</sup>安格妮丝领导的唱诗班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宁波教会音乐在185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也表明宁波会众圣乐音乐活动的逐渐完善化。

安格妮丝的音乐活动并不仅限于在宁波组织教会唱诗班,她还利用自己会弹奏风琴和钢琴的特长为教会服务。安格妮丝的音乐活动一直持续到1861年底宁波被太平军占领后才停止。安格妮丝虽因战乱被迫迁往上海,但她的音乐活动并未停止。她在以教英文维持生计的同时,仍不忘参加教会的各类音乐活动。1866年7月号的《教会传教记录》中的传教士通信中就有她可能在上海中国人教堂中弹奏风琴的记录。<sup>[9]16-17</sup>值得一提的是,与戴德生所说的“累赘”相反,安格妮丝后来不仅没有给教会增添任何负担,反而以自己的才能为教会默默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她死后甚至为教会留下了一笔遗产,用来在上海建“郭士立眼科医院”。<sup>[12]</sup>

### 三、海伦·倪维思(Helen Nevius) 1850年代在宁波的音乐教学活动

早期在宁波致力于教会音乐事业的不仅有安格妮丝这样的业余乐工,也有受过音乐教育的专业人士。1850年代在宁波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中,海伦·倪维思(Helen S. Coan Nevius, 1833-1910)在推广圣乐教育上所做的工作无疑是最多的,也是最有成效的。

海伦·寇恩·倪维思(见下图2)是著名传教士倪维思(John L. Nevius, 1829-1893)的妻子。<sup>①</sup>她们夫妇是受美国北长老差会派遣,于1854年初抵达宁波的,但由于身体的原因,她只在宁波断断续续地共住了七年。1858年监管宁波义塾的孟丁元(Samuel N. D. Martin)因病离甬返美后,倪维思还一度担任该校监管。<sup>[13]95</sup>海伦·倪维思在她的《我们在中国的生活》的一书中,说她1854年“抵达宁波六个月后,就开始在我们长老会所办的两所寄宿学校教唱歌”。<sup>[14]39-40</sup>她所提到的这两所寄宿学校应该就是以上提到的崇信义塾和1846年11月麦嘉缔和谷玄夫人(Mrs Richard Cole)开办的宁波长老会寄宿女校“崇德女塾”。<sup>②</sup>



图2 海伦·寇恩·倪维思<sup>③</sup>

① 倪维思1854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甚丰。除在宁波开设男女寄宿学校外,倪氏夫妇在1860年后内地开放后,还在杭州以及山东的登州等地开设过男女寄宿学校。倪维思在山东宣教四十年,有“山东苹果葡萄之父”之称。关于倪维思,见Everett N. Hunt, Jr. “The Legacy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15. 3 (1991): 120-124. 倪维思也曾翻译过赞美诗,他和另一传教士教育家、齐鲁大学的创建者狄考文(Calvin W. Mateer)两位翻译过200余首圣诗。

② 关于宁波长老会女学堂的创办、负责人员、早期发展情况,见Robert E. Speer ed.,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A Memorial of Divie Bethune McCartee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22), pp. 90-92.

③ 图片来源: Chinese Recorder 41. 8 (1910): 552.

在海伦·倪维思之前,宁波长老会女校已开始教授唱歌,<sup>[8]90</sup>学生们也非常喜欢唱歌。据在学校任教的传教士自己说,到1850年代中期,女校学生对唱圣歌甚至已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一群女孩经常聚集在教室里,似乎从唱歌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有时他们知道将一本赞美诗集唱完才停下来。”<sup>[15]51;[6]75</sup>

教会学校学生唱圣歌的热情虽然高,但是因为女校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音乐教师,学生只能是自己听传教士唱赞美诗,然后模仿着学唱,所以学习的效果不是很好。这使得一些传教士不免有些挫折感。如1849-1856年负责监管该女校的兰显理(也称兰亨利)太太(Mrs. Henry Van Vleet Rankin)在给同会传教士的通信中就不无气馁地流露到:“她们每天都听我们唱(圣诗),也试着学唱,但却不成功。”<sup>[6]74-75</sup>但海伦·倪维思担任教师后,由于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定期的音乐基础课,学生的歌唱水平开始有了明显的提高。据1855年女校的年度报告称,该年度初始就有一些来自女校师生及另一差会学校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班,每星期由倪维思夫人上两次音乐基础课。海伦·倪维思采用的是与美国国内音乐教学一样的教学方式。最初几个月注重练唱基本音阶及节奏节拍训练,到9月时已初见成效:“学生们可以非常合拍得唱出超过20支经常在美国国内教堂使用的曲子。大部分的学生已经可以凭记忆唱这些曲子,不论是音符还是那些用罗马字母拼写的宁波方言赞美诗。传教士们认为这些学生们的音乐才能与国内的那些孩子们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sup>[6]75</sup>

海伦·倪维思又是怎样教学生唱歌的呢?幸运的是,海伦·倪维思在她1868年出版的《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一书中,对她的音乐教学活动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她说她到宁波后的第一年就教过“大约40个男童,30个女孩”。他们通常“一星期在小教堂聚集两次”。<sup>[14]39-40</sup>她还详细地提到她音乐课的具体教学内容(五线谱、半音和全音练习、多声部歌曲)及实际教授方法:

因为我们没有音乐课本,我让人做了一块上边有线的黑板,以便书写乐谱,这块黑板很有用。我一般先教他们同声共唱一个单音,跟他们讲解后,我会对他们说:“现在注意听我讲,然后再准确地唱这个音。”学生们试着去做,但是所发出的音,有的差一个音,有的差三个音,有的甚至差四、五个音。差不多一个八度中的每个全音和半音都有。<sup>①[14]40-41</sup>

面对这些实际困难,倪维思夫人没有灰心,而是不断地想办法鼓励学生,“很好,我鼓励他们说。‘不过,我觉得你们有能力唱得更好。’然后,‘我再给他们一个高音和一个低音,让他们明白其中的不同。然后又给他们解释说,我希望他们模仿我,唱得越像我越好。我把‘Do’故意唱得很长,为的是让他们更容易地模仿我。学生们试着照我说的去做,这一次唱得就好得多。我认为学生的嗓音不应超过五个或六个音域。我们花了差不多整整两个小时齐声唱同一个音,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聚在一起时,学生们已经可以相当准确地齐声唱同一个音。然后,我们开始加第二个音,do-re, do-re, re-do, re-do,我们就这样一直反复唱,直到唱得我们都觉得烦了,然后才又加上第三个音。当学生们对什么是乐音和音程有些基本概念时,我才把这些音符写在了黑板上。”<sup>[14]40-41</sup>

从以上倪维思夫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她的教学方式已经很有因材施教的特点,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步并进。更可贵的是,在实际的音乐教学当中,海伦·倪维思还根据中国学童的特点,摸索出了一套她自认为教中国学童学习外国音乐“最实际可行的方法”。她的具体的做法是首先教学生练习唱音阶:“开始的三个月我们很少练别的,只练习音阶,这一点他们最终完全掌握了。他们不仅可以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把自然音程唱得很准,而且可以把其它任何一个音程唱得完美无缺。比如说,从一度到四度、从根音到七

① 此段及以下所引均取自笔者2007年之译文。见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之开创》(上),载《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第7-8页。

音，他们正着反着都可以唱得出来”。<sup>[14]41-42</sup>然后，她教学生练习简单的乐句：“我还把一些简单的练习写在黑板上让他们练习，每当听到我小时候学过的一些歌曲能从这些中国小孩的嘴巴里不但节拍准确而且旋律优美地唱出来时，我就觉到非常有成就感，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sup>[14]41-42</sup>最后，她教学生用首调唱法练唱多声部歌曲，还教他们打拍子：“我不仅仅让他们局限于唱通常的 do-re-me 等，从很早开始我就用单字代替唱名，然后有很容易地加入了一些唱词。我在发现了他们各自的嗓音适合什么声部后，就开始把班上的学生分成不同的组，唱不同的声部。在短短的六个或八个月内，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男高、女高、中音、低音四声部皆备的唱诗班。考虑到当时的条件，他们演唱的准确性还是非同寻常的。从一开始，我还教他们打拍子，结果打拍子就成了他们的习惯。我注意到，就连他们自己唱歌自娱时，他们的手也习惯性的轻轻摆动，肘弯下的小手臂一下一上、一左一右的挥动，就像平时[上课]打拍子那样。”<sup>[14]41-42</sup>

由于方法得当，“中国儿童很容易的就学会了识谱”，而且还掌握了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多声部歌唱的基本技能。<sup>[14]41-42</sup>

#### 四、宁波刊行的曲谱赞美诗《赞神乐章》(1856)

早期在宁波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宁波不仅在教会学校中教授音乐，也通过出版赞美诗集来介绍西方乐理。美国浸信会真神堂传教士罗尔梯 (Edward Clemens Lord, 1817-1887) 早在 1856 年就由设在宁波江北岸的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了附有多声部曲谱 (四声部五线谱) 的赞美诗集《赞神乐章》(英文名为: *Hymns and Tunes Compiled by E. C. Lord*) (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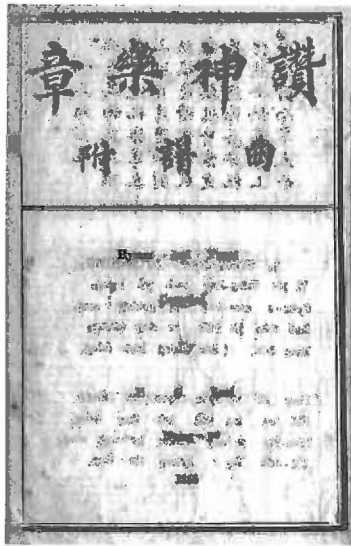


图3 赞美诗集《赞神乐章》<sup>①</sup>

华花圣经书房<sup>②</sup>是美国新教长老会在宁波创立的一个印刷出版机构，它原设在澳门，1845 年迁至宁

① 笔者所见为牛津大学鲍德莱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藏本，编号 1636。

② 也叫宁波华花书房，“华”指中国；“花”指美国，即花旗国。

波,同年9月1日开始使用。著名的上海美华书馆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sup>①</sup>《赞神乐章》的篇幅不大,仅有赞美诗24首,加总赞词1首。五线谱旁的歌词既用汉字又有拼音化了的宁波土话。汉字用文言文。歌词不是直接排列在乐谱之下,而是与歌词分列。左边印乐谱,右上边列汉字歌词,右下方列罗马拼音宁波方言(见图4)。《赞神乐章》的这种双种文字的编排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后来出版的方言赞美诗集,除以下谈到的《圣山谐歌》外,均无此类排法。《赞神乐章》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意义在于它可能是“最早的中国实用五线谱印本。”<sup>[16]359</sup>



图4 《赞神乐章》

《赞神乐章》的编者罗尔梯本名为爱德华·科勒门斯·罗德(Edward Clemens Lord),早年毕业于纽约汉密尔顿神学院,1846年8月受洗后由美国浸信教会同年底派遣到中国传教,1847年携新婚妻子露茜(Lucy Thomas Lyon, 1817-1853)抵达宁波,并于同年10月31日与1843年11月即到甬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enial J. McGowen, 1814-1893)一道在宁波西门成立了华东地区最早的浸信教会。1851年,因露茜健康的原因,被迫回美国。1853年5月露茜病逝后<sup>②</sup>,罗尔梯与莱恩小姐(Freelove Lyon)结婚,并与同年11月携再婚妻子重返宁波。罗尔梯的妻子于1860年在宁波城北江滨(今永丰路原16中学址)创立了一所浸会女校,后改名圣模女校。<sup>[17]124</sup>1863年罗尔梯因与美国浸礼会国内差会意见有分歧,辞职独立传教,同年就任美国驻宁波领事职。但1881年和浸礼会恢复了关系,之后继续进行传教及教育工作。1887年染时疫死于宁波。<sup>[18]294</sup>

## 五、宁波刊行的五线谱课本《圣山谐歌》(1858)

宁波不仅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五线谱赞美诗集的刊行地,也可能是中国最早出版实用五线谱课本的地

① 关于华花书房及其所刊印书报目录,见黄时鉴:《宁波华花书房刊本知见略述》收入《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宁波,2005年,第353-362页。

② 详细资料见“Lord papers, 1835-1854 宁波华”<https://asteria.fivecolleges.edu/findaids/mountholyoke/mshm050.html> (Accessed: 11/13/2015)。

方。<sup>①</sup> 这就是1856年来华的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应思理 (Elias Brown Inslee, 1822 - 1871) 编纂的《圣山谐歌》(Sing-san-yia-ko. Hymns set to Music)。此赞美歌集由宁波华花书房于咸丰八年(1858年)仲秋刊印(见图5), 因其中对西洋基本乐理有简明扼要的介绍, 所以被史学界一学者认为“可能是首次在中国出版的五线谱课本”。<sup>[16]36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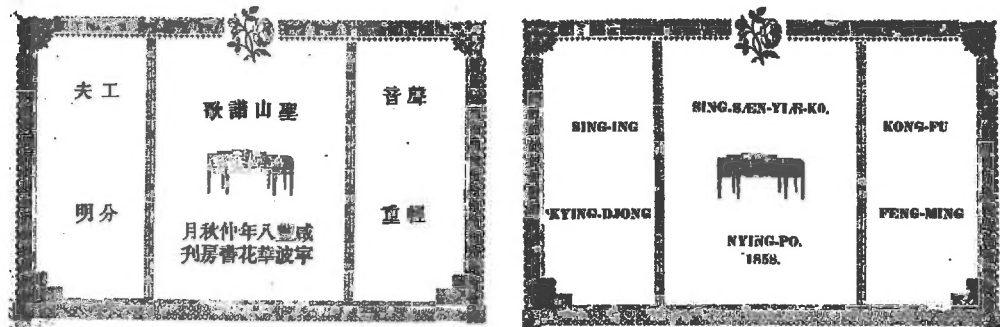


图5 《圣山谐歌》<sup>②</sup>

《圣山谐歌》的编者应思理1822年4月23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 New Jersey), 1856年他受美国长老会宗所派, 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次年1月1日到目的地宁波。<sup>[19]243-244; [20]1-44</sup> 几年后因为与所派差会有分歧, 1861年美国长老会海外布道会终止了他的任命。应思理不得已举家回美, 但三年后受朋友资助作为独立传教士再次来中国传教。他也会短期地隶属于英国伦敦传教会。这次他选择的传教地点是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杭州。应思理在杭州办男女书塾时, 也都曾设立过音乐课程。<sup>[21]96</sup> 除办学外, 应思理在宁波时还继玛高温之后编辑过“宁波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中外学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1854 - 1861)”。<sup>[20]4-6</sup> 1867年他与美国南长老会接触, 同年6月被派赴华, 所以, 他也被称为第一个被美国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sup>[22]31-32</sup> 应思理在杭州的工作后来由司徒雷登的父亲接任。<sup>[23]12</sup>

《圣山谐歌》是应思理在宁波传教时编纂的。此书虽是赞美诗集, 但与罗尔梯的《赞神乐章》一样, 《圣山谐歌》有多声部曲谱(四声部五线谱), 其中的113首赞美诗均用文理和拼音化了的宁波话。但与罗尔梯做法不同的是, 《圣山谐歌》中的汉字和拼音歌词与线谱不是分开印的, 而是印在歌谱下的。汉字印在第一声部旋律下, 罗马字母翻译的宁波方言印在第二、第三声部的音符下面(见图6)。

① 国内学界一般将五线谱的最早传入中国追溯到1713年成书的《律吕正义》。见刘奇:《中国古代传入的基督教教会音乐探源》; 席臻贯:《从康熙皇帝的音乐活动看〈律吕正义〉》; 王震亚:《西洋乐理输入探源》(此三文分别刊载在《音乐研究》, 1987年1期、1988年3期和1990年4期)。但用王震亚先生的话说(第62页):“此书的内容不能算充实完整, 有遗漏, 体例有些混乱, 所用的语言、名称和现代乐理极少相同, 有些地方很费解。看得出并未在实践中运用, 多系理性的推演。”

② 笔者这里所引图例为牛津大学鲍德莱图书馆藏本(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编号1827。



图6 《圣山谐歌》

《圣山谐歌》除在排版方式上不同外，其内容及编纂形式等方面也都与之前出版的基督教赞美诗集相异。它的特殊之处有三点：一是它书中的“唱谱图”（见图7）；二是它前五页是约2600字的基本乐理部分（“唱言缕晰”）（见图8）；三是其中所附的不仅有五线谱，而且有三首“主音嗖乏”（Tonic Sol-fa）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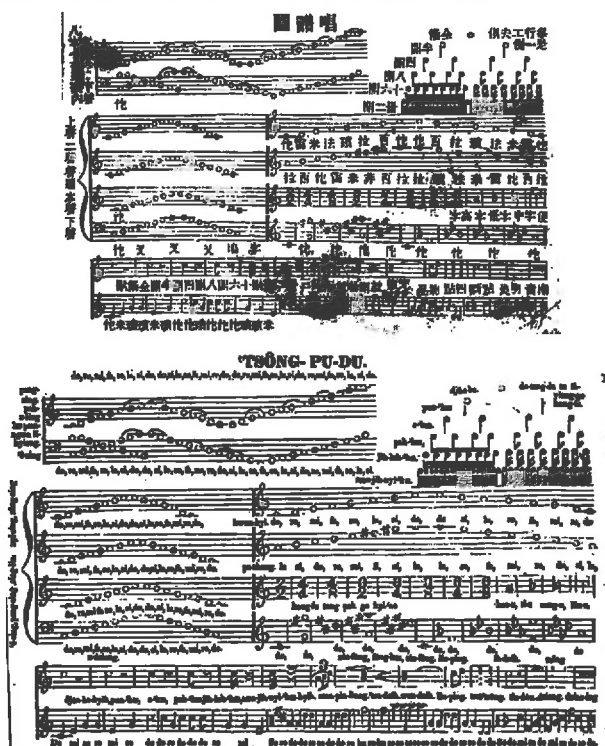


图7 《圣山谐歌》中的“唱谱图”



图8 《圣山谐歌》的基本乐理部分

关于《圣山谐歌》中所介绍西方乐理的基本内容、编纂形式以及其在中西音乐交流史上的价值，史学界已有数位学者著文讨论过，此不赘述。<sup>①</sup>但《圣山谐歌》中所包括的“主音嗖乏”记谱法（见图9）却仍有讨论的必要。<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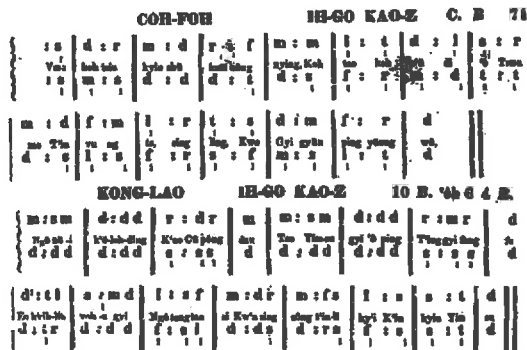


图9 《圣山谐歌》中的“主音嗖乏”记谱法

“主音嗖乏”记谱法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它的出现及传播与基督教新教教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主旨是为了方便教会信众学唱圣诗。此法由英国基督教公理会牧师约翰·格文（John Curwen, 1816-1880）在欧洲大陆和英国数种音乐教学法的基础上综合而成。先是在英伦三岛推广，后来随着十九世纪海外宣教运动的兴起，由英美新教传教士传播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美国、印度、中国、日本及太平洋岛屿地区。<sup>③</sup>随着鸦片战争后大量外籍人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的涌入，这种记谱法也就被传入了华土，在教会活动中和传教士办的学校中多有应用。应思理《圣山谐歌》中的三首“主音

① 其中介绍最详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黄时鉴教授。见黄时鉴：《宁波华书房刊本知见略述》收入《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浙江宁波，2005年），第359-361页。

② 有关“主音嗖乏”体系在中国的流传，国内外虽有个别学者提到，但所举的实例不多。且在时段上都稍后，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主，不足以窥见其流传全貌。笔者曾以1861年8月即赴香港，后又转往北京、上海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为例，对“主音嗖乏”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的实例做过分析，详见官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西国乐法东渐——从傅兰雅的教学实践看“主音嗖乏”教学法在晚清的传播》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8页。

③ 关于约翰·格文与“主音嗖乏”音乐教学法的兴起，以及在亚太国家地区间的传播，可参见 Watkins Shaw, “atkins Shaw, 在亚太国家地区间的传播，可参见但所举的实例不多。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 77. 1 (1950): 17-26; Robin S. Stevens, “tevens, gs of the 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 稍后，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主，不足以 Asia-Pacific Journal for Arts Education 5. 1 (2007): 52-76。

“嗖乏”谱例告诉我们,早在1850年代末,来华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介绍五线谱的同时,开始尝试这种适合初学音乐的人,尤其适合教授旋律、和声、调式和调性都简单的音乐教学方法。这也印证了传教士帅福守(Edward W. Syle, 1817-1891)1867年在一封反驳香港一位外籍人士武断地说中国境内没有音乐教学活动的信中所提到的以下之事实:“上海圣公会所办的几所学校很多年前就开始教中国男童和女童识谱,而且非常成功。……我们宁波长老会的朋友的做法和我们基本相同,早在1858年他们就出版了一本有二百五十首曲调的圣歌集,其中用到 tonic-sol-fa 记谱法。”<sup>[24]28</sup>

### 结 语

以上,笔者以目前所知中国大陆十九世纪最早设立音乐课的宁波崇信义塾、安格妮丝·郭士立与宁波英国安立甘会男童学校的歌唱班、海伦·倪维思1850年代在宁波两所学校的音乐教学活动、宁波1856年刊行的曲谱赞美诗《赞神乐章》、1858年刊行的五线谱课本《圣山谐歌》为例,对五口通商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宁波开设的音乐课及学校课外的音乐活动进行了抽样分析。这些例子虽不十分完备,但已清晰地表明,早在1904年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施行的前近六十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宁波已开始在其所办的学校中教授音乐。海伦·倪维思1850年代在宁波两所寄宿学校教唱歌的实例也表明,早在有“学堂乐歌之父”之誉的沈心工1903年2月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开设唱歌课之前近五十年,基督教传教士已用与美国国内音乐教学一样的教学方式教授中国孩童唱多声部歌曲。应思理《圣山谐歌》1858年的刊印也证明,在曾志忞编著的、有“中国近代最早出版的音乐教科书之一”<sup>[3]21</sup>之称的《教育唱歌集》一书1904年4月由东京教科书出版之前四十六年,宁波的基督教会及教会为中国贫儿办的学校已有介绍五线谱和“主音嗖乏”记谱法的乐理课本,中国儿童已有能力唱多声部歌曲。

### 参考文献:

- [1] 宫宏宇. 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J]. 音乐研究, 2007(1): 5-17; (2): 40-46.
- [2] 伍雁谊. 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 [3] 孙继南. 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9.
- [4] 史静寰, 王立新.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 [5] 田力, 马先红. 宁波崇信义塾史略[J]. 宁波大学学报, 2012, 27(5): 57-63.
- [6] 田力. 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在浙东地区早期活动研究(1844-1868)[D]. 宁波: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 [7] 凯瑟琳·布鲁纳, 费正清, 理查德·司马富. 步入中国仕途: 赫德日记(1854-1863)[M]. 傅曾仁, 刘壮翀, 潘昌运, 王联祖, 译.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3.
- [8] Robert E. Speer ed.,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A Memorial of Divie Bethune McCartee* [M].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22.
- [9] M. Miles. *Blind and Sighted Pioneer Teachers in 19th Century China and India* [R/OL]. EDRS, 1998. <http://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14701.pdf>. Accessed 11 January 2016.
- [10] R. A. W. The Blind Chinese Teacher [J]. *Female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March 1, 1861: 33.
- [11] 林健. 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概括及影响[J]. 金陵神学志, 2007(1): 74-91.
- [12]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M].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2008.

- [13] Joshua C. Garritt. *Jubilee Papers of the Central China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4 - 1894* [M].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
- [14] Helen S. C.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 [M]. New York: Hurst and Company, 1868, reprint 1869.
- [15] *The Seven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 Published for the Board, 1854.
- [16] 黄时鉴. 宁波华花书房刊本知见略述 [C] // 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5: 359 - 362.
- [17] 谢振声. 近代宁波传教第一人: 玛高温 [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0 (2): 123 - 127.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1.
- [19]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M].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 [20] 卓南生. 宁波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1854 - 1861) 原件及其日本版之考究 [J]. 新闻学研究, 2008 (96): 1 - 44.
- [21] G. Thompson Brown. *Earthen Vessels and Transcendent Power: 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 1837 - 1952* [M].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7.
- [22] Samuel Isett Woodbridge. *Fifty Years in China* [M]. Richmond, VA: 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 1919.
- [23] 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 [24] E. W. Syle. Music among the Chinese [J]. *Dwight's Journal of Music*, 1867, 27 (4): 28.

【责任编辑：吴志武】

###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ristian

#### Missiona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1850 - 1860

Gong Hong-yu

(Music Departmen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315211)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views music class and extracurricular musical activities which had been organized b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fter the Treaty of Five Ports Commercial Intercourse opened in Ningbo during 1850s. The author aimed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role of missionaries for music educ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The author took the musical activities of Agnes Gützlaff and Helen Nevius in the Ningbo Boy's Academy/Boarding School during 1850s as examples, cases also including Hymns and Tunes Compiled in 1856 and Sing - san - yia - ko. Hymns set to Music in 1858.

**Keywords:** Christian Missionaries; Music education; the Ningbo Boy's Academy/Boarding School; Agnes Gützlaff; Helen Nevius; Edward Clemens Lord; Hymns and Tunes Compiled; Elias Brown Inslee; Sing - san - yia - ko; Hymns set to Music

